

大数据侦查中信息收集的边界研究

吕泽卿 冯娜

长春工业大学，吉林长春，130000；

摘要：在大数据技术深度融入侦查实践的背景下，信息收集的边界争议日益凸显，亟须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规范。本文以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为核心目标，从价值、方法、行为三个维度构建大数据侦查信息收集边界的思考框架。价值维度以人权保障为底线逻辑，通过隐私权、人格尊严和程序正义的保护划定价值边界；方法维度立足中国治理理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法治德治结合和系统治理理念的适应性转化；行为维度聚焦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重塑，明确主体权限、程序适配和手段审查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探讨信息收集的实体边界与程序边界：实体边界通过区分内容与非内容、一般与敏感、当事人与案外人信息确立差异化标准；程序边界从敏感信息调取、对外共享规则、信息挖掘分析限制构建全流程控制机制。研究表明，边界确定是融合技术特性、法律价值与治理逻辑的动态过程，对推动大数据侦查法治化及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大数据侦查；信息收集；边界研究；人权保障；中国治理理论

DOI：10.69979/3029-2700.25.12.083

1 问题的提出

在数字技术革命推动下，人类社会全面迈入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价值在公安司法领域的深度应用催生了“大数据侦查”这一新型侦查模式。据公安部统计，截至 2024 年，全国公安机关建成各类大数据侦查平台 327 个，通过大数据分析破获刑事案件占比达 41.7%，大数据侦查已成为打击犯罪的核心手段之一。

然而，大数据侦查在展现强大破案效能的同时，其信息收集活动正面临严峻的边界争议。2023 年“某市公安局大数据平台违规采集市民社交数据”事件中，侦查机关未经合法审批获取公民即时通讯内容；2024 年“某省侦查部门过度分析未成年人上网记录”案件中，对未成年人网络活动信息的收集超出案件必要范围，这些案例暴露出当前信息收集存在明显“越界”倾向。这种越界既表现为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侵害，再例如某案件中侦查机关未经审批获取公民医疗记录，也体现为对侦查权运行规律的违背，还有部分地区存在“数据先行、有罪推定”的侦查惯性。

在此背景下，研究大数据侦查中信息收集的边界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从理论层面看，有助于构建融合技术特性、法律价值与治理逻辑的新型侦查理论框架；从实践层面看，可为规范大数据侦查活动、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提供具体指引^[1]。

2 确定大数据侦查中信息收集边界的思考维度

2.1 价值维度：人权保障的底线逻辑

从法理学视角看，大数据侦查中的信息收集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干预，需遵循“权利冲突理论”与“比例原则”。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中强调，“权利是个人握在手中的政治王牌”，隐私权、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作为宪法位阶的价值，构成信息收集不可逾越的边界。我国《宪法》第 33 条确立的人权保障原则，在法理学上体现为“权利保障优先于效率追求”的法治理念，要求信息收集必须符合最小必要原则——即侦查手段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不得超过实现侦查目的所需的最低限度。

人权保障作为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在大数据侦查中体现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底线保护。我国《宪法》第 33 条确立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为信息收集划定了不可逾越的价值边界，通过三项基本权利的保障得以实现：

第一，隐私权的防御性保护构成信息收集的首要边界。大数据环境下，隐私权内涵已从“独处权”扩展至“信息自决权”。德国宪法法院在“人口普查案”中确立的“信息自决权”理论，强调个人对自身信息的收集、使用与传播享有控制权。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 条规定信息处理应遵循“必要原则”，要求信息收集严格限定在与案件相关的必要范围内。如电信诈骗案件中，

侦查机关仅能收集与诈骗行为直接相关的通信记录,不得获取嫌疑人家庭医疗信息。

第二,人格尊严的完整性维护是信息收集的伦理边界。人格尊严作为我国《宪法》第 38 条保障的基本权利,要求信息收集不得损害个人的人格独立性与自主性。“数据画像”技术若过度整合个人生活细节,可能导致“数字人格”被片面定义,损害人格尊严完整性^[2]。

2.2 方法维度:中国治理理论的适应性转化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要求信息收集边界的确定体现多元主体利益协调。这一理念在大数据侦查中,体现为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商机制。如确定互联网企业数据协助义务边界时,应通过立法听证、专家论证等方式,平衡侦查需求与企业商业利益、用户个人信息权益。实践中,某省公安机关在制定大数据侦查规范时,邀请互联网企业、律师协会和公民代表参与讨论,形成了兼顾各方利益的信息收集规则^[3]。

在法理学的背景下,“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和“社会契约论”有着理论上的联系。——国家侦查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让渡的部分权利,因此信息收集边界的确定需体现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亚里士多德“法治包含良法之治与普遍服从”的经典论断,在我国治理实践中转化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双重约束标准。《人民警察法》第 22 条对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规定,既体现实证法学派“法律命令说”的强制力,也蕴含自然法学派“道德义务先于法律义务”的伦理要求。

3 大数据侦查中收集信息的实体边界

3.1 区分内容信息与非内容信息

从法理学角度,内容信息与非内容信息的区分源于“信息权能理论”——前者涉及个人思想表达的核心领域,受我国《宪法》第 40 条“通信秘密”保护的强度更高;后者作为附属信息,其收集边界的划定需遵循“合理期待原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卡茨案”中确立的“隐私合理期待”标准,与我国《民法典》第 1032 条对隐私权的界定具有共通法理,即判断信息是否受保护需考虑“个人是否对其具有客观合理的隐私期待”。例如,元数据中的 IP 地址变动虽属非内容信息,但若其能够揭示特定个人的行动轨迹,即可能落入“合理隐

私期待”的保护范畴,此时信息收集需符合更高的法律程序^[4]。

内容信息的严格保护边界构成信息收集的核心限制领域。内容信息指通信中包含的实质内容,如邮件正文、通话录音等,与个人隐私核心领域密切相关。我国《宪法》第 40 条对“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主要针对内容信息。在大数据侦查中,对内容信息的收集必须遵循最严格法律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50 条,需经过严格批准手续,且限于严重犯罪案件。如某省公安机关在办理普通盗窃案件时,违规收集嫌疑人即时通讯内容,即属于越界行为。

3.2 区分敏感信息与一般信息

敏感信息的特殊保护源于法理学中的权利梯度理论——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对人格尊严的影响程度存在“权利位阶”,生物特征、医疗健康等信息涉及人格核心领域,需施加“高门槛保护”。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敏感个人数据的“单独同意”要求,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9 条的法理基础均在于“重大权益处分需更充分的意思自治”。此外,比例原则在敏感信息收集中的适用体现为“三阶审查”,目的合法性、手段必要性、法益均衡性,这与德国法理学中“过度禁止原则”的内涵高度一致。

第一,敏感信息的高门槛收集边界体现对个人核心权益的特殊保护。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9 条,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在大数据侦查中,敏感信息的收集虽无需个人同意,但必须满足更严格法律条件。一是案件类型特定性,限于严重案件;二是收集目的唯一性,只能用于案件侦查;三是审批程序严格性,需经侦查机关负责人及以上级别同志批准。敏感信息的范围在大数据时代呈扩大趋势,除法律明确列举的生物特征、医疗健康等信息外,“行为轨迹信息”和“网络身份信息”也应纳入管理。

第二,一般信息的合理收集边界需要在侦查效率与权利保障间寻求平衡。一般信息指除敏感信息外的其他个人信息,如姓名、性别等,对个人权益影响相对较小,但仍需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大数据侦查中,一般信息的收集边界应把握收集方式合法性、范围必要性、目的特定性。如盗窃案件中收集嫌疑人职业信息是必要的,收集其兴趣爱好信息则超出必要范围^[5]。

4 大数据侦查中收集信息的程序边界

4.1 严格敏感信息调取的程序规定

敏感信息因其特殊保护需求,调取需遵循更严格程序。从罗尔斯“纯粹程序正义”理论来看,分级审批机制通过预设公平的程序规则,使无论结果如何都能获得正当性。该机制体现了“权力分工制衡”的法理逻辑,通过层级化审批防止单一主体滥用权力,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中权力监督的内核一致。分级审批的程序框架构成敏感信息调取的核心控制机制。

审批程序的实质化是防止程序空转的关键。审批程序的实质化要求(如对关联性、必要性的审核)契合德国法理学中的“比例原则”,即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兼顾目的正当性与手段必要性。全程留痕制度则呼应了“程序可追溯性”原则,通过记录权力运行轨迹实现“看得见的正义”,这与德沃金“权利作为王牌”理论中程序对权利的保障性要求相契合。审批主体需对调取敏感信息的案件是否符合法定范围、信息与案件的关联性、范围是否为最小必要进行严格审核。某直辖市检察机关建立的“敏感信息调取备案审查制度”,要求侦查机关在调取后3日内将审批材料报送检察机关备案。

4.2 完善对外共享信息的程序规则

审批内容的全面审查(如对共享对象资格、用途合法性的审核)则源于“法律保留原则”,即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得随意处分。

共享审批的双轨制程序平衡侦查效率与信息安全。其法理基础在于“权利救济平等原则”与“权力法定原则”的结合。主动共享的内部审批体现“职权法定”要求,防止侦查机关超越权限对外提供信息;被动提供的书面申请程序则遵循“程序参与原则”,赋予申请主体表达意见的权利,符合程序正义中“当事人有权参与影响其权益的决定”的基本要求。区分“主动共享”与“被动提供”,主动共享由侦查机关负责人审批;被动提供由申请单位提出书面申请^[6]。

审批内容的全面审查(如对共享对象资格、用途合法性的审核)是共享程序的核心,其源于“法律保留原则”,即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得随意处分。审批主体需审查共享对象主体资格、用途合法性、必要性及安全保障措施。某省侦查机关建立的“信息共享安全评估机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共享

对象信息安全能力进行评估。

5 结语

大数据侦查中信息收集边界的研究是数字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从价值、方法、行为三个维度构建信息收集边界的思考框架,系统探讨实体边界与程序边界的具体内容,为大数据侦查的法治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研究表明,大数据侦查信息收集边界的确定,需充分考虑大数据技术的特性,融合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中国治理的理论创新与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要求。在实体边界方面,科学区分不同类型信息,设置差异化收集边界;在程序边界方面,建立全流程的程序控制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侦查信息收集的边界并非静态不变,而是随着技术发展、社会需求和法治进步不断调整的动态平衡。未来的研究应当更加关注边界的动态调整机制,如建立基于技术评估的边界更新制度、引入公众参与的边界协商机制等。

参考文献

- [1] 张明楷. 大数据侦查中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边界[J]. 法学研究, 2023, 45(3): 112-128.
- [2] 龙宗智. 论大数据侦查中的比例原则适用[J]. 中国法学, 2022, 35(4): 98-115.
- [3] 王利明.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理念与制度构建[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42(6): 134-152.
- [4] 周光权. 重大刑事案件中敏感信息收集的法律规制[J]. 法学家, 2023, 36(2): 103-119.
- [5] 陈瑞华. 侦查权行使的合理边界——以当事人与案外人信息区分为视角[J]. 政法论坛, 2022, 40(5): 87-101.
- [6] 左卫民. 大数据侦查中敏感信息调取程序的完善[J]. 现代法学, 2023, 45(2): 136-149.

作者简介: 吕泽卿, (2000-至今), 男, 汉族, 吉林长春人, 法学硕士在读,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

冯娜, (1977-至今), 女, 汉族, 吉林长春人, 吉林大学法学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